



金·属·镜

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

根据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资料

[俄] A. A. 提什金 H. H. 谢列金 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译

文物出版社



金属·属·镜

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

根据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资料

[俄] A. A. 提什金 H. H. 谢列金 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译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陈杰
责任编辑 黄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 / (俄罗斯) 提什金，
(俄罗斯) 谢列金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北京：文物
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5010 - 3508 - 3

I. ①金… II. ①提… ②谢… ③陕… III. ①金属—
古镜—研究—俄罗斯 IV. ①K885. 1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1838 号

A. A. Тишкін, Н. Н. Серегін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ЗЕРКАЛА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ДРЕВНЕЙ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АЛТАЯ

本书根据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2011 版译出

© A. A. Тишкін, Н. Н. Серегін, 2011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y Cultural Relic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的中文版专有版权属于文物出版社

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

[俄] A. A. 提什金 著
H. H. 谢列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译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9.75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508 - 3 定价: 100.00 元

序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部，东、南濒临大海，西部被横断山系、青藏高原、阿尔泰山系及大漠环绕，北方有阴山—燕山及大兴安岭等山系凭护，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特征使得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和多元一体的特征。由于海上文化通道的开辟相对较晚，并且在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陆上文化通道尤其是连接东西方世界桥梁的欧亚草原带便成了中国与外部文化交流碰撞的主要途径。

考古发现表明，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楔形、柱形石核以及石锯、锛形器、石钻等均与中国北方下川文化的同类器存在高度的相似性。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伯利亚地区的石器工业就与中国北方存在着某种联系。

到了新石器时代，东西伯利亚的尖底、圜底罐文化系统与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心的平底罐文化系统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交流，以平底筒形罐系统为媒介，将黄河流域每一次冲击浪潮传递给远在西伯利亚及其周边的圜底罐系统。磨制的石锛、镰形石刀和陶器中的螺旋纹、“之”字纹、鼓腹平底罐等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突然出现，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考古学文化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影响力。红山文化的庙坛冢、东北腹地出现的圜底罐等，则应是来自西伯利亚的文化反馈。这些现象表明两地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逐步拓展。

青铜时代以降，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式青铜器及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等对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影响至深。与此同时，兴起于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代表中国文化元素的蛇纹鬲等则向周边传播，出现在蒙古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就连草原民族最具特色的大型容器圜底双耳青铜釜（鑊），其形态和传统也深深根植于殷周以来的中国地区。

进入铁器时代，以匈奴帝国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及其军事压力带给中国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东周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反映在物质文化遗存上，便是中国北方长城的修建、相关城址和聚落址的骤然增多且规模空前，以及位于匈奴境内的色楞格河下游竟然出现了代表农耕定居色彩的多处城址和中原式墓葬。

历史上的这种文化交流趋势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高潮。

事实上，直到现在，这种交流还在延续，而且由于地缘关系，它将会永远演绎下去。

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是引进的西方考古学方法和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又使中国考古学深深烙下了前苏联考古的印记，不仅在考古机构的设置模式上与前苏联大体相仿，而且指导思想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西安半坡遗址的大规模揭露便是对苏联聚落考古方法的借鉴和尝试，此后这一方式和理念逐步得以普及和践行。尽管两国间的考古研究后来由于历史原因中断了联系，但客观地讲，这段短暂的蜜月期，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由所谓“史语所传统”向“中国学派”的转变，也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考古理念和方法，并且尝试着在考古实践与研究中推广应用。这种新“西化”的趋势，不仅使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走向多元化，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进程。大约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也发生着巨变，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泱泱大国，其思想基因注定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对考古学材料的一些新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更何况两国间还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疾呼，中国考古在向西看时，千万不能忘记曾经影响了我们古代文明进程和对我们的考古事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邻邦——俄罗斯。

苏秉琦先生早就提出了“以区系的眼光看世界，以世界的观点看中国”的指导思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学者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则必须了解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中俄考古合作除了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外，业已形成的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也使得这种合作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然而，长期缺乏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限制了双方考古资料的共享，也限制了田野考古方法及学术理念的沟通，这种局面成了中俄考古界深化学术研究合作的瓶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作为省一级的考古研究机构，本来不该妄谈这么大的话题，但陕西是块神奇的土地，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辉煌的篇章都曾在这里谱写，陕北部的黄土高原又是欧亚草原边缘，地处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交汇地带，历史上，当草原骑马民族对定居农业文明骚扰和征服的同时，也通过欧亚草原这个桥梁将两个大陆以往互不知晓的信息进行了传递。因此，在全球视野下对以陕北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地带考古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似乎应该也必须有所作为。

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通过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并且谙熟俄语的王继源认识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科瓦廖夫教授。科瓦廖夫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但却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他用那带着浓重俄语口音，并且夹杂着一些汉字的英语，滔滔不绝地向我和王占奎副所长讲述着对有关陕北考古资

料的看法。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非常熟悉中国的考古资料，能够很好地把握中俄双方考古的关切，应该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合作研究伙伴，我当时就幻想着可否通过科瓦廖夫来构筑中俄考古合作的桥梁。

时光荏苒，科瓦廖夫第三次来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时已经是2010年，但他这次不是孤身一人，同时还带来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代表——阿尔泰国立大学的提什金教授和圣彼得堡国立列里霍夫家族研究院的邦达连科教授。大家汇聚一堂，不仅畅谈了合作的前景，还一同对陕北相关区域进行了实地考察，增加了双方的合作信心。2011年12月，按照双方约定，我带领王占奎、肖健一完成了对俄罗斯的回访，这次回访最重要的收获是实现了与阿尔泰国立大学校长Sergry V. Zemlykov教授和圣彼得堡国立列里霍夫家族研究院邦达连科馆长签署三方合作协议书，这其中包括了将在未来的五年中，联合进行相关的考古调查，共同发起并组织学术会议，相互提供学科出版物以及对相关文献、专业书籍进行翻译出版，组织青年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咨询和培训等内容。我们这次组织翻译出版的A. A. 提什金、H. H. 谢列金的《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按照协议，我们还将于今年派出两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到阿尔泰大学考古工地，参与俄罗斯的考古发掘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俄罗斯同行的考古合作已经迈开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我深信，通过未来一系列的合作以及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不仅可以强化对各自考古资料与研究进程的相互了解，拓展学术视野，沟通学术理念，为双方培养专业人才，也有利于对欧亚草原地带诸如早期农业在北方地带的扩散、草原地带和农牧交错地带的人地关系、草原地带古代人群的形成与迁徙、冶金术、造车术以及骑马术这些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等考古课题的深入研究，推动欧亚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发展。

王炜林

中文版自序

在研究人类的历史文化时，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保存在考古遗址中的物质生产信息。综合研究考古发现的遗物不仅可以复原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生产系统的方方面面，而且可以解决一些普遍与具体的学术问题。在阿尔泰冢墓出土的器物中，金属镜总会引起研究者的格外注意。人们常常根据这些器物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发掘墓葬的年代，理解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

中亚游牧民族古代和中世纪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中国的军事政治以及贸易关系。近年来，在考古学的学术文献中经常会出现根据现有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然而，重建游牧民族同中国文明长期联系的总体面貌仍然是未来的事情。

要看中国物质文化对周围区域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游牧民族使用中国手工业中心生产的金属镜。自斯基泰—塞克时期开始（公元前 1000 年），这类器物就出现在南西伯利亚及相邻区域。

在中国有大量研究金属镜的著作。然而，中国的学术著作，大部分没有涉及中国境外所发现的这类器物，包括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客观原因的制约——俄语学术文献难以获得、语言障碍、两国考古学家接触较少等。这就导致了中国研究者至今仍然没有看到很多重要的问题。例如，金属镜对于中亚游牧民族来说是奢侈品，所以经常被仿造；中国金属镜上的图案和题材经常被游牧民族重新诠释，并运用到其他器物上；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就是中国金属镜在游牧民族埋葬习俗中的位置；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境内也发现了“游牧民族”的金属镜，但是如果不了解俄语的考古文献，那么就无法对它们的文化归属进行客观的判断。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由于上述的那些原因，俄罗斯的研究者同样远远没有得到所有的中国考古文献。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两国的研究者需要紧密合作。

本书旨在研究阿尔泰境内遗址出土的古代和中世纪时代的金属镜。中文版的出版是解决以往积累的学术问题的步骤之一。在该书准备期间，作者们完全体会到了上面提到的困难。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综合研究中国金属镜的俄语著作是 37 年前 E. I. 卢

博 - 列斯尼琴科 (1975 年) 所撰写的。虽然这本著作的成就无可争议，但是其中的许多观点已经过时，需要修正。我们希望，即将开展的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合作研究，并在此框架下进行的本书的翻译出版，将大大扩大我们的联系范围，并促进众多重要学术问题的解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教授为开展学术合作提供了机会，也使该书的翻译出版成为可能，在此，作者们向王院长表示感谢。

A. A. 提什金

H. H. 谢列金

引言

在研究人类历史文化时，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保存在考古遗址中的物质生产信息。综合研究考古发现的遗物不仅可以复原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生产系统的方方面面，而且可以解决一些普遍与具体的学术问题。在阿尔泰冢墓出土的器物中，金属镜总会引起研究者的格外注意。人们常常根据这些器物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发掘墓葬的年代，理解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

在学术文献中，“镜”是一种特别制作的器物，具有光滑的表面，能够形成其面前物体的光学图像，能够反射光线（БСЭ, 1972, с. 514; Кузнецова, 2002, с. 19）。最早的镜发现于公元前 3000 年的考古遗址中，由金属（铜或者青铜）制作而成（Авилова, 2008）。Н. Л. 奇连诺娃称两河流域以及北伊朗可能是金属镜的发源地，由此在青铜器时代形成的传统可能渗透到中亚乃至古代东方的其他地区（1967, с. 89 – 90）。在铁器时代早期，金属镜在欧亚大陆广泛地传播开来。虽然有过尝试，但是至此为止它们的形态多样化还没有出现，各个文化历史区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征。金属镜的制作是以铜为基础，经常加入不同的合金成分。正面一般平整，经过抛光，反面有浮雕或者阴刻图像，中央还有用于悬挂的钮，边缘也有多种形状。许多金属镜在制作时都带有侧面的手柄，这种侧面手柄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而且反映审美的需求，并补充中心题材的思想内容，展示形制的传统及创新。在斯基泰—塞克时期，人们通常使用带有两个光滑表面的金属镜。最为流行的镜面形状为圆形，但是也发现有四角和椭圆形以及带有花边和其他造型的金属镜。

金属在具备一种特定晶格结构的条件下会反射光泽，古代的工匠发现了金属的这一物理特性并予以广泛运用。然而，这样制作的金属镜有一个根本缺陷：铜或者青铜的自然色泽会改变照射物体的颜色。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它们不仅成为真理和知识的象征，而且也被看做是欺骗和虚伪的化身。为了克服存在的问题，满足相应要求，人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试验、发现、失败，最后使用不同的玻璃材料来代替全金属器物，但是这一过程不是连续的。除此之外，在新的梳妆器物生产技术中，金属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反射作用。

玻璃镜出现于公元 1 世纪的罗马。最初，这种器物非常小，形状不甚规则。其制

作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向玻璃球面容器中注入熔化的金属，熔液凝固后形成一个反射层，待冷却后，切开金属容器，玻璃镜就做好了。这种带有铅层或锡层的玻璃镜在中世纪初期就已经消失了。类似的器物在公元13世纪重新出现。在公元16世纪，人们发明了锡汞合金的玻璃镜镀膜，为此人们使用了汞，汞形成必要的均匀的液体，然后渗入金属。自公元17世纪开始，随着玻璃生产的发展，镜的式样及大小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工匠们能够很好地生产出金属镜，并在玻璃板的一面涂上一薄层银、金或者锡。此后，有害健康的汞合金被化学镀银代替。为了保护反射层，在其表面还常常覆盖一层铜片，然后用油漆材料固定，用于预防机械损伤。再往后，开始生产由白金、黄金、钯、铂、镍以及其他金属制造的反射膜的镜。镜的质量取决于其表面形状接近数学定理的程度。平面镜是唯一能够在任何光束照射下传送无失真图像（永远是假象）的光学系统（БСЭ，1972，с. 514）。

虽然出现了玻璃镜，但是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继续制作和使用金属镜，不过在公元14世纪之后，这种镜制作得也越来越少。现在人们使用古代和中世纪的器物用来制造纪念品，同时也为博物馆制造复制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下列问题：在现代古董市场上开始出现古代镜的赝品。为了制造此类仿制品，人们采用了现代的工艺和合金，只有借助专门的仪器才能辨别出来。这种生产技术，总的来说，不断在提高。在印度，长达几个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人们都仍然保留着复制手工艺品的传统。

金属镜的起源、普及以及广泛使用的历史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不言而喻的是，这类器物是一种非常宝贵、很有信息含量的资料，可以解决我们在解释考古资料时碰到的很多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的金属镜被人们视为年代和民族文化的特征器物，它们也展示了人们获得传统及原始合金的特殊的技术手段。镜上的图像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墓葬出土的金属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过偶然发现的金属镜也具有一定的信息，需要人们想办法去提取。同时，因为一些有意思的因素，出现了非直接使用金属镜的情况。例如，它们可以作为萨满服装的标志使用，也可以作为护身铠甲的部件使用（Бобров, Худяков, 2008, с. 33）。

迄今为止，阿尔泰的森林草原区及山区出土了一批金属镜，其年代从青铜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后期。它们的资料散见于许多出版物。有关考古遗址出土的以及偶然发现的这类器物的研究成果见于专著的个别章节、论文和许多简报中。这些著作我们都收到了本书的文献目录中。金属镜的毋庸置疑的价值决定了各种层次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综合和全方位研究它们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以图录的形式发表博物馆的藏品是撰写一本科学著作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研究金属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已有的经过检验的方法来系统分析阿尔泰出土的所有器物（Тишкун, Горбунова, 2004; 2005; Горбунова, Тишкун, 2005;

Горбунова, Тишкун, Хаврин, 2009; и др.). Т. М. 库兹涅佐娃在她的专著 (2002) 中作了一次有关斯基泰时期的金属镜的形态分析及系统分类的尝试。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方法, 其合理性为大规模、细致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为了完成既定的计划, 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库, 我们还必须检测这些物质文化器物的合金的化学成分。采用光谱分析方法进行的金属器研究以前就有了 (Тишкун, Хаврин, 2004; 2006; Тишкун, 2006а – б; 2008; 2009)。这些经验保证了后续工作的效率, 增加了必要信息的数量, 为各种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因此, 我们不妨引用著名的中国文化学者 Г. Г. 斯特拉坦诺维奇的看法: “从青铜制造器物的技术史角度我们当然要高度评价镜” (1961, с. 52)。

在撰写本书时, 作者使用了阿尔泰国立大学 (巴尔瑙尔) 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保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金属镜, 其中有 18 个完整器物和 16 个残片。第一章简短地介绍了这些藏品的历史。第二章为我们特别制作的现有器物的图录。所有发表的器物都经过若干次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检测 (在对博物馆展品进行研究的时候, X 射线荧光光谱仪具有实质性的优势) (Тишкун, Хаврин, 2006)。我们对所得结果进行的阐述见于第三章。其余两章阐述了这些器物的有关问题, 即它们的年代、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世界观及社会组织的复原。上述问题的部分方面, 本书作者过去曾做过分析, 但是这些问题还需要全面探讨 (Кирюшин, Тишкун, 1997, с. 87 – 89; Тишкун, 2006а – в; 2008; Тишкун, Хаврин, 2006; Тишкун, Горбунов, 2006; Серегин, 2007; 2008а – б; Тишкун, Горбунов, Серегин, 2008; и др.)。

如前所述, 对阿尔泰出土的金属镜尚未有人做专门的综合研究。但是现有的资料基础有助于在现代水平上组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为此, 除了那些有名的金属镜之外, 我们还应当收集那些我国博物馆收藏的尚未发表的墓葬出土品和采集品。

目 录

序	王炜林 I
中文版自序	IV
引 言	1
第一章 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中金属镜收藏的形成	1
第二章 古代和中世纪铜镜图录	16
第三章 X 射线荧光分析及金属镜化学成分的测定结果	52
第四章 金属镜作为古代和中世纪阿尔泰考古文化的特征器物 (年代和民族文化联系)	76
第五章 游牧民族观念中的金属镜 (世界观和社会角度)	95
结 语	103
文献目录	105
俄文缩写目录	125
人名、地名、考古词汇对照表	127
英文提要	135
后 记	137

插图目录

图一 阿尔泰墓地出土的阿尔贊—迈埃米尔时期金属镜	3
图二 阿尔泰墓地出土的巴泽雷克时期金属镜	6
图三 塔拉斯金—V山墓地出土的中世纪早期金属镜残片及其相似器物	13
图四 青铜时代晚期墓地出土的金属器	77
图五 阿尔贊—迈埃米尔时期带有凸棱的金属镜	79
图六 铁器时代早期阿列伊草原墓地出土的中心带有桥形钮的圆饼形金属镜	80
图七 斯基泰—塞克时期墓地出土的“印度”铜镜	82
图八 匈奴时期金属镜	84
图九 中世纪金属镜	87
图一〇 阿尔泰中世纪早期遗址出土的金属镜	88
图一一 奥辛斯基墓地出土的金属镜残片	92
图一二 蒙古时期金属镜	93

图版目录

图版一 马雷—贡宾斯基—科尔东 - I 墓地 1 墓 28 出土的铜镜	17
图版二 马雷—贡宾斯基—科尔东 - I 墓地 1 墓 34 出土的铜镜	18
图版三 马雷—贡宾斯基—科尔东 - I 墓地 1 墓 24 出土的铜镜	19
图版四 马雷—贡宾斯基—科尔东 - I 墓地 1 出土的铜镜（采集品）	20
图版五 马雷—贡宾斯基—科尔东 - I 墓地 1 出土的铜镜（采集品）	21
图版六 上耶兰达 - II 墓地冢墓 13 出土的铜镜	22
图版七 特特克斯肯 - VI 墓地冢墓 2 出土的铜镜	23
图版八 别洛库里哈市附近残墓出土的铜镜	24
图版九 菲尔索沃 - XIV 墓地墓 58 出土的铜镜	25
图版一〇 阿尔泰共和国出土的铜镜（采集品）	26
图版一一 卡斯塔赫特墓地冢墓 28 出土的铜镜	27
图版一二 佩尔沃迈墓地出土的铜镜（采集品）	28
图版一三 老阿列伊 - II 墓地墓 35 出土的铜镜	29
图版一四 特特克斯肯 - VI 墓地冢墓 80 出土的铜镜	30
图版一五 特特克斯肯 - VI 墓地冢墓 94 出土的铜镜	31
图版一六 巴赫奇 - XI 墓地出土的铜镜残片（采集品）	32
图版一七 菲尔索沃 - XIV 墓地出土的铜镜残片	33
图版一八 亚洛曼 - II 墓地冢墓 51 出土的铜镜残片	34
图版一九 亚洛曼 - II 墓地冢墓 52 出土的铜镜残片	35
图版二〇 亚洛曼 - II 墓地冢墓 56 出土的铜镜残片	36
图版二一 亚洛曼 - II 墓地冢墓 57 出土的铜镜	37
图版二二 亚洛曼 - II 墓地冢墓 61 出土的铜镜残片	38
图版二三 希别 - II 墓地冢墓 3 出土的铜镜	39
图版二四 希别 - II 墓地冢墓 18 出土的铜镜	40
图版二五 近耶尔班 - XVI 墓地墓 6 出土的铜镜残片	41
图版二六 近耶尔班 - XVI 墓地墓 9 出土的铜镜残片	42

图版二七	叶卡捷琳诺夫卡 - III 墓地冢墓 5 出土的铜镜残片	43
图版二八	波波夫斯卡娅达恰单座冢墓墓 1 出土的铜镜残片	44
图版二九	罗戈济赫 - I 墓地冢墓 10 出土的铜镜残片	45
图版三〇	阿尔泰边疆区出土的铜镜残片（采集品）	46
图版三一	乌斯季—沙蒙尼赫 - I 墓地墓葬出土的铜镜	47
图版三二	沙德林采沃 - I 墓地冢墓 1 墓 4 出土的铜镜残片	48
图版三三	亚罗夫斯科耶 - III 墓地冢墓 1 出土的铜镜残片	49
图版三四	捷列乌特夫兹沃兹 - I 墓地冢墓 1 出土的铜镜残片	50

第一章 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 博物馆中金属镜收藏的形成

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创建于 1985 年（Кирюшин, Шамшин, Нехведавичюс, 1994; Нехведавичюс, Ведягин, 1995; Горбунов, Чудилин, 2000; Горбунов, 2009; и др.）。当时的藏品是田野发掘得来的。自 1975 年开始，阿尔泰国立大学的同事、老师及学生们主要在阿尔泰边疆区——包括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现在的阿尔泰共和国）——从事发掘。1986 年，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及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的命令，博物馆成为官方机构。在其 26 年的历史中，博物馆做了大量的工作（Горбунов, 2009）。每年都有新的考古文物进入博物馆（Кирюшин, Тишкун, Шамшин, 2002），现在共有 620 多件登记藏品，它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至中世纪时代晚期。博物馆还收集了少量的民族文物。这些文物为我们研究阿尔泰的部落及民族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为我们重建南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起源和历史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还拥有档案库房，收藏了 245 部体现考古调查及发掘成果的科学报告（Горбунов, 2009, с. 29）。

在众多的馆藏文物当中，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金属镜是特别的一组。此类器物可以视为阿尔泰山区及森林草原区存在的若干不同文化的鲜明指针。作为金属铸造艺术文物，这些器物需要综合分析（Торевтика…, 2010）。我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回顾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金属镜藏品的形成历史及研究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方面的个别研究结果已发表于我们的一些著作中（Тишкун, 2008; Тишкун, Горбунов, Серегин, 2008; 2009; Тишкун, Серегин, 20096; и др.）。不过，本书将予以补充和订正，同时大大扩充多方面的信息。

已经发表的金属镜多半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其余器物的年代为中世纪早期和中期。这些文物的获得主要来自配合经济工程规划（建设公路、土地开垦以及其他）进行的考古发掘，其高峰就是在卡通河水电站的淹没区和坝址所做的田野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有目的的科学研究发掘。在描述所得金属镜的研究结果及相关信息时，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归入文化年代框架中（Тишкун, 2007a），并且介绍阿尔泰国立

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品的形成过程。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阿尔泰的考古工作量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在考古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获取了研究比较薄弱的有关斯基泰早期居民文化的补充资料。在卡通河谷地发掘特特克斯肯-VI墓地（Кирюшин, Тишкин, 1997）和博伊特格姆-II墓地（Абдулганеев, 1994）时，我们获得了两面阿尔赞—迈埃米尔时期的金属镜（图一，1、2）。阿尔泰国立大学的比克考古队在发掘比克遗址（Тишкин, 1996, рис. 4. - 2; 27. - 3; 20076, рис. 7. - 27, 29; Кирюшин, Тишкин, 1997, рис. 66. - 2 - 3）时发现了另外两面镜（图一，3、4）。它们均属于比克文化的末期，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50年至75年间（Тишкин, 20076, рис. 7）。这些器物起初存放在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内，后来转交给戈尔诺—阿尔泰共和国方志博物馆（现在的阿尔泰共和国安诺新民族博物馆）。

有些铜镜（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品编号No. 26）来自于马雷—贡宾斯基—科尔东遗址群的发掘。遗址群位于鄂毕河的右岸，阿尔泰边疆区首府巴尔瑙尔市西北7公里。编号为“墓地1”的墓葬群年代属于斯基泰早期。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Ю.Ф.基留申、В.Б.博罗达耶夫、А.Л.昆古罗夫、М.Т.阿布杜尔甘涅耶夫在此作了发掘（Абдулганеев, Кунгурев, 1990; Кунгурев, 1998; 1999; Фролов, 2008, с. 388 – 389）。该墓地曾被定为老阿列伊文化的早期阶段，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末期（Кирюшин, Кунгурев, 1996, с. 133）。在墓地出土的铜镜中，年代最早的是两面边缘出高尖棱的大型铜镜（Кунгурев, 1999, рис. 2. - 4 - 5）。其中一面的中央有桥形钮（图版一）^①，另一件的钮则做成“四脚按钮”的样子（图版二）。类似器物被定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末期（Членова, 1967, с. 82 – 87; Могильников, 1997, с. 81; Кузнецова, 2002, с. 33 – 43; Кирюшин, Степанова, 2004, с. 84; и др.）。根据总体特征，其他三面金属镜（Кунгурев, 1999, рис. 2. - 1 - 3）的年代或可定为公元前6世纪（图版三~五）。

菲尔索沃-XIV墓地属于老阿列伊文化发展的下一个阶段。鄂毕河考古队在A.Б.沙姆申领导下于1987年至1993年对它作了发掘。菲尔索沃-XIV墓地位于阿尔泰边疆区佩尔沃迈县同名村庄的附近。墓地开始被定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Шамшин, Фролов, 1994, с. 101）。根据墓地出土的器物群的早期特征，可以把大部分文物归入公元前5世纪（Кирюшин, Кунгурев, 1996, с. 133）。稍后，菲尔索沃-XIV墓地的年代改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Фролов, Шамшин, 1999, с. 223）。

^① 铜镜的详细说明及图版在下一章中以图录的形式提供。它们按地域—年代的原则排列，每个图版由一张线图和三张照片组成，以便从各个角度展示器物。